



陈坚作品《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·南京》

绘画者本人供图

64年前的8月15日,日军宣告投降;9月9日,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于南京举行——

陈坚:受降日与我身边的历史

□快报记者 孙兰兰

惊觉:我的画室就在受降旧址旁

灰白的外墙色调,坡屋顶上覆盖灰色波纹金属瓦。大礼堂平面呈长方形,两侧楼房一字排开,虽然不高,却气势逼人。大礼堂入口处有高大宽敞的门廊,四对八根爱奥尼亚大柱“顶天立地”撑起了屋顶。门廊上方还有一座哥特式的四层钟楼。

整个建筑很新,显出翻新修复的痕迹。正中间的厅廊原汁原味,上面钟楼的顶部大修过,下面的台阶换了,两侧小楼,原先与大礼堂并未连为一体,窗户也由木质改成了金属边框。

陈坚以前的画室就在大礼堂侧楼里,《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·南京》(以下简称《公元》)落笔时,画室坐落在西侧一间屋子;后来,又搬到东侧。《公元》完成后不久,这座原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的建筑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进行整体大修,他的画室才从这里搬了出来。

冥冥中,似乎有种奇妙的缘分。

1975年,从士兵成长起来的画家陈坚由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,走进南京军区机关大院。每天在大礼堂进进出出,他并不知道这里就是抗战胜利后日本人签字投降的地方。直到1987年,陈坚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“淘书”,买了一本《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》。书中收录了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旧新闻,题为《日军投降一幕》,短短千余字,他读了好几遍,几乎可以背出来:“1945年9月9日九时到九时二十分,是我们历史上最光荣最肃穆的二十分钟。在这二十分钟内,日将冈村宁次到我陆军总司令部签订了日本投降书……”

这是一个中国人应该铭记的时刻,但很久以来却很少有人提及,在中国绘画史上更是一个空白。让陈坚激动的是,他惊讶地发现,书中照片上的签字仪式所在地是那么熟悉:原来就在自己身边。

再回画室,陈坚情绪难以平复。他常常想,这座小楼里

究竟发生过怎样的风云际会,他试图用画笔记录下来。他像历史学家一样,四处搜寻与之相关的文字记录和老照片,认真考证每个细节,揣摩着那些历史人物在那一瞬间的神情。

蒋介石将仪式定在“三九良辰”

《公元》其实有两稿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幅油画,已经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。该画长6米,高2.2米,气势恢宏,画面上200多位人物栩栩如生。

“1993年,我开始落笔构思,画得不慢,1995年就画好了。”第一稿的名字叫《日落》,并没有公开展出发表。陈坚说,凭着一股激情和冲劲,他完成了《日落》,但之后,越来越感觉到画作有许多不足。这么重大的历史题材,是需要冷静思考的。1998年,他再度提笔,花了整整五年时间,重新构图作画,并将作品名字改为《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·南京》。在历史面前,无须用“日落”这样掺杂了感情色彩的词语,因为自有评说;用公元年号时间来记录,更显公正、客观、庄严。

九月九日上午九时,为什么正式受降时间选在此时?

陈坚说,这个时辰是蒋介石亲自定的,颇有讲究。一至十的各个数字中,中国人向来最崇尚九,以为天地之数,始于一而终于九,逢九即为大吉大利。蒋介石信风水,因而将受降签字仪式举行之时定在三个“九”字相遇的时候,寓意“三九良辰”。

根据记载,1945年9月9日,南京满城欢腾。街上用松柏枝叶扎起彩色牌楼。黄埔路的中央军校大门上写着“和平永奠”、“中国陆军总司令部”等字样。定为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主会场的大礼堂,庄严气派。大礼堂正面,是一个用松柏枝扎的匾,上书金色大字“和平永奠”。各个入口处都有士兵和宪兵守卫,戒备森严,气氛庄重。礼堂中央挂着孙中山像。遗像对面墙上挂着中、美、英、苏四国元首的肖像。日本投降代表签字的地方,悬挂着四盏巨型荧光灯,耀眼夺目。投降席对面为受降席,四周肃然挺立武装士兵。

黄埔路3号。

警卫森严的南京军区大院深处,是一幢中西合璧风格的大礼堂,充满了神秘色彩。

64年前的8月15日,日军宣告投降;9月9日,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于南京举行,在这幢建筑里,日本人向中方代表低头。那天,究竟是怎样的场景呢?几十年后,一位军旅画家在受降仪式旧址旁的小小画室里,用笔触还原了这个时刻——《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·南京》。

这幅在第十届全国美展上一举夺得油画金奖的巨幅作品,其艺术感染力自不必说。近日,我们采访到了这幅作品的绘者陈坚,请他细细讲述画中定格的那个历史瞬间。



陈坚

197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。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、江苏省油画学会副会长。主要作品有《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·南京》(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)、《1949年春·进驻南京总统府》(第十届全国美展一等奖)。

快报记者 赵杰 摄

签字台两旁是见证盛典的国外来宾和新闻记者……

陈坚努力将记载中的历史碎片,拼凑起来。

“你仔细看,就会发现我们原来印象中的很多东西,都搞错了。”就拿军服上挂的资历标来说,日军的顺序刚好与其他国家的相反;将官领章钉法也与中方将官不同,将星不在领章正中,而是从边沿钉起,即使一颗星也在一侧。

军人在室内脱帽,中日双方都是如此。开始,陈坚在投降桌与受降桌上都画了军帽。后来他在照片上看到,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,旁边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拿起,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,照片上左侧军服褶皱不对劲,鼓出来一块。仔细研究才发现,原来小林浅三郎双手抬起时,腋下夹着他的军帽,而他坐着时,军帽是拿在手里的。他恍然大悟,再画军帽,中方将领的军帽在桌上,日方将领的军帽只有一顶,是冈村宁次的,他要签字盖章,其他日将的军帽都在手上,这才符合历史的真实。

还原受降席“三色布”

越是深入研究,陈坚越发现人们在创作反映那一段时期的艺术作品时,错误比比皆是。特别是很多影视作品,简直洋相百出!

“有时候真是气得看下去。有一部影片讲的也是抗战时期的故事,日本宪兵戴的袖章上面竟然写着‘MP’,这明明是英国宪兵的袖章,竟然被套用到了日本人胳膊上!”军人的严谨天性,让他对那些马虎敷衍、歪曲历史的态度非常鄙视。

服饰、领章、“中正剑”的佩戴、受降时特有的臂章标记……陈坚细细考证着每一个细节。

对历史的文字记载,难免粗线条;而当时留下来的照片由于技术原因,很多细节也模糊不清。“当时,南京博物院用复制品模拟了受降签字仪式的现场,我跑过去一看,投降席和受降席上包的布是蓝色、白色、蓝色。总觉得不太对劲。”他回家找资料图片比对,虽然照片都是黑白的,但仍然可以分辨出是深浅不一的三

种颜色,复制品显然错了。参照当年受降仪式会场布置运用的色彩搭配,陈坚断定“三色”应该为蓝色、白色、红色,这正是中华民国国旗的颜色。

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,陈坚看到复制的受降席和投降席上,桌布颜色也犯了同样错误。他对工作人员提出了异议。对方疑惑地反问:“国民党怎么会用红色?”令陈坚哭笑不得。

后来,陈坚的这些考证得到了曾经亲历受降仪式的王楚英老人的肯定。“《公元》属历史题材的作品,所表达的內

容是极其严肃的重大事件,通过正面的纪实手法来表现这一重大事件,是唯一可取之道。”陈坚很坚持,当然,这与艺术创作并不矛盾。比如,为了烘托氛围,凸显出礼堂这个地标,签字仪式的地点,被他从室内搬到了室外广场,庄严肃穆的大礼堂成为整个画面背景。

“南京的受降仪式上,日军将领没有交出军刀,因为他根本就没把军刀带来,而是在仪式下悄悄递交的。”

——陈坚

“南京的受降仪式上,日军将领没有交出军刀,因为他根本就没把军刀带来,而是在仪式下悄悄递交的。”

即不得再行佩带军刀。以上规定,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。”日本军官随身所佩军刀,从来是不离身的。中国战区决定在日军投降签字时,解除他们的军刀,并将冈村宁次、小林浅三郎、今井武夫的军刀,分别献给何应钦、萧毅肃、冷欣。

受降仪式上没有交出军刀

《公元》中的何应钦直立挺拔,面对日军将领展现出胜利者的自豪和威严。然而,他的左手却在轻轻拨动桌面,似乎流露出一丝内心的骚动不安。日军代表的神情也很复杂,虽然弯腰低头向中华民族认罪,拱手递交投降书,脸上却有着不服的神情。“当时,日军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军事实力,但迫于国际战局形势的压力,不得不投降。”陈坚这样理解。

很多人不明白,《公元》画面中,陈坚为何选择日军将领递交投降书这一场景。按照常理,军人交出武器,这才是最大的失败,这样不是更具代表性,也更有视觉冲击力?

陈坚揭秘:南京的受降仪式上,日军将领没有交出军刀,因为他根本就没把军刀带来,而是在仪式下悄悄递交的。在各地举行的日军投降仪

如果有一种说法是:何应钦主持受降仪式前,曾派他的参谋王武到冈村宁次住处,秘密地告诉冈村,参加投降仪式时可以佩带指挥刀,但必须在礼堂内将指挥刀呈交给何应钦,否则就不带刀。带与不带,可由冈村自己选择。冈村当然不愿成为呈交指挥刀的败将,于是免了缴械一幕。

这个说法是大有来由的。何应钦与冈村宁次,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,而且私交颇深。他对冈村百般照顾,一方面出于老交情;另一方面,因为蒋介石有言在先,对投降的日军要“以德报怨”。何应钦深深领会到蒋介石的用心。

如果有一种更好的画面效果,在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手上添一把军刀,这对一名画家来说,再简单不过。陈坚选择了尊重历史。只是,这也成为他心头无法弥补更遗憾的遗憾:那把沾满中国同胞鲜血的屠刀,本该是在这个神圣的仪式上收缴的。